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

于翠玲 著



卷一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

于翠玲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 / 于翠玲著. --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2.1
(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ISBN 978-7-5657-3015-3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图书史—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75954 号

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

ZHONGGUO SHUJI WENHUASHI YANJIU

著 者 于翠玲
策划编辑 黄松毅
责任编辑 欧丽娜
封面设计 宇宙尺度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 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e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16千字
版 次 202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3015-3/G·3015 定 价 78.00元

本社法律顾问: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一、总体思路 / 1
- 二、各章要点 / 2
- 三、修订情况 / 6

第一章 古代书籍的编辑与出版概念

- 一、古代书籍的编辑概念 / 8
- 二、古代编辑与出版的关系 / 14
- 三、古代书籍编辑与刊刻的总体格局 / 18

第二章 西方书籍史视角下中国出版史的差异

- 一、以媒介为关键词的历史比较:《古今图书集成》是典型案例 / 28
- 二、以印刷书为标志的传播革命:不能仅以西方为尺度 / 29
- 三、以工具书为案例的跨文化比较:中国类书有特殊的文化语境 / 32
- 四、书籍“交流圈”流通环节比较:《古今图书集成》刊印方式变化 / 35
- 五、书籍文本形态的革命:从抄本到数据库 / 37
- 六、中、西书籍史比较的启示 / 39
- 附录:汉字文化圈的书籍史比较 / 42

第三章 “同文之治”语境下《康熙字典》的编辑特征

- 一、编辑动机：“同文之治”的特殊意义 / 45
- 二、编辑顺序：《清文鉴》在前、《康熙字典》在后 / 48
- 三、注重声韵：《佩文韵府》与《康熙字典》比较 / 50
- 四、特殊效应：奉为“字典”与文化控制 / 55

第四章 《康熙字典》在近代的出版流变

- 一、政治环境变化：打破偶像 / 59
- 二、字典观念改变：推陈出新 / 62
- 三、印刷流通方式变化：进入市场 / 65

第五章 官修类书的编辑传统及其终结

- 一、标榜文治的编辑理念 / 69
- 二、文献一统的编辑体例 / 72
- 三、以类相从的编排方法 / 75
- 四、类书编辑传统的终结 / 78
- 五、古代类书的文献价值 / 81

第六章 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

- 一、中国古代的“博物”观念 / 85
- 二、中国古代博物知识的分类体系 / 89
- 三、西方“博物学”概念的引进 / 91
- 四、西方博物学概念与中国博物资料比较 / 93
- 五、中国近代新式博物书籍的特点 / 99

第七章 类书文献与狐幻文学

- 一、狐的动物属性与祥瑞说 / 103
- 二、狐的形象与诗文 / 107
- 三、狐的幻化与小说 / 109
- 附录:古籍中的“司晨鸟” / 115

第八章 诗歌选本与梅花文化

- 一、“别出梅花一类” / 120
- 二、参照类书体例 / 123
- 三、汇辑评注资料 / 125
- 四、梅花文献的文化价值 / 129

第九章 摘句品诗与名句传播

- 一、摘句与诗歌品评 / 132
- 二、诗选与“秀句”集 / 136
- 三、摘句品诗的特点及评价 / 140

第十章 儒士读书与隐士读书

- 一、儒士的读书方式 / 146
- 二、隐士的读书方式 / 153
- 三、陶渊明的读书生活 / 158

第十一章 读书文化与家族风尚

- 一、读书目的:士人的志向与技能 / 169
- 二、读书方法:苦读与“涵泳” / 172
- 三、图书收藏:读书种子不绝 / 176

第十二章 女德教化与闺塾阅读

- 一、为“女德”作《女诫》 / 183
- 二、为《诗经》动情肠 / 188
- 三、才女的读书空间 / 192
- 四、媒介变迁与女性解放 / 197

第十三章 康熙朝文人对宫廷藏书的阅读利用

- 一、布衣文人走进宫廷的机遇 / 202
- 二、抄录宫廷图书的条件 / 204
- 三、抄录宫廷图书的启示 / 210

第十四章 康熙朝文人对西学书籍的阅读取向

- 一、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及其启示 / 214
- 二、朱彝尊对西洋传教士的看法 / 217
- 三、朱彝尊对传教士书籍的评价 / 219
- 四、康熙帝对士人阅读取向的引导 / 222

第十五章 西书传入与文化融合

- 一、利玛窦：“合儒”的传教策略 / 226
- 二、梁启超：融合中西学术 / 232
- 三、国学复兴与文化传承 / 242

第十六章 古代传播史料的整理与利用

- 一、古代传播史料的整理价值 / 249
- 二、古代传播史料的整理框架 / 253

- 三、古代传播史料的综合利用 / 256
- 四、古代传播史料的词语阐释 / 257
- 五、伊尼斯引用中国史料的偏差 / 263

第十七章 古代采诗传统与近代办报观念

- 一、古代文人的“采诗”说 / 270
- 二、近代报人的“采诗”说 / 274
- 三、传统“采诗”说的突破 / 277
- 四、媒介功能与社会变革 / 278

绪论

一、总体思路

本书的研究范围是中国的书籍文化史,即以书籍为中心的研究,主要指中国的古代书籍,也涉及近代书籍。书籍具有物质形制和文本内容,便于携带,可以复制,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书籍的历史涉及编辑史、出版史、印刷技术史、媒介史、阅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书籍史研究包括书籍从产生到传播的复杂过程,“不仅要探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研究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①。因此,书籍与文化系统不可分割,书籍史就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将具体的书籍的案例,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宏大的文化系统之中加以考察。

中国的书籍史(或称图书史、书史)源远流长,古代对书籍的整理形成了目录、版本、校勘等专门学问。民国时期的学者将其概述为中国文献学,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编写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是第一本以文献学命名的书籍,作者指出:“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京,此为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②这已经揭示了中国典籍与文化密切相关,显示了中国文明的特色。所谓文献就是指典籍,“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所以考制度,稽意识,文化之积业,政道所由系。无论何国,对于文献之保存、研讨,必尽其力之所

① 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8-89.

②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

能而优为之”^①。中国的典籍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意义重大,必须尽力研讨。这本文献学包括结集著录、校理审订、讲习传授、翻译外学、编纂刊印等内容,实际上涵盖了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可以说,中国文献学已经为书籍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笔者的硕士、博士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正是以文献学为基础,进入了中国书籍史的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的书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涉及编辑观念、编辑体例、刊印技术、流通环节,还有读者阅读、图书收藏诸多方面。在西学书籍输入之后,经过长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国的书籍文化和出版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也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从西方的媒介史、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视角来看,中国的书籍史与西方的书籍史存在着差异,可以相互比较,由此中国书籍史所具有的文化特征更为清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当今“国学”复兴的文化氛围中,梳理中国书籍史的发展脉络,以史为鉴,温故知新,也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广而言之,书籍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每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书籍有关的各种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书史研究的对象。因而它绝不仅仅是书籍本身形制和内容的演化史,更是一部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②。通过考察书籍本身的历史,我们便进入了长时段的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学术视野。

二、各章要点

基于上述思路,本书主要以中国的书籍文献为基础,提出值得探讨的问题,选择有意义的书籍案例,加以梳理和研究。下面简单概述各章的内容要点,顺带说明写作的相关背景。

第一章总体概述中国古代书籍的编辑与出版问题。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曾被称为“朝阳产业”。多家高校设立了编辑学专业,专家学者开始研讨中国特色的编辑学,而编辑史是建构编辑学的基础。为什么中国学者首先提出的是“编辑学”?编辑在中国的书籍史上担当什么角色?编辑活动是如何起源的?这都是值得思考和必须回

①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

② 芬克尔斯坦,麦克利里.书史导论:译者前言[M].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

答的问题。笔者从1995年开始,为编辑学专业的本科生讲授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课程,就是从“编辑”这个关键词(概念)开始切入的,由此与“出版”概念以及出版史联系起来。本章梳理中国古代编辑出版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近代以及当代出版文化的演变过程。

第二章借鉴西方书籍史的视角,以中国古代官修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为聚焦点,探讨中国出版史的特点。近年来西方书籍史、阅读史、媒介史的书籍不断被翻译引进,为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提供了参照视角。值得探讨的是,中国书籍史与西方书籍史存在差异,这不仅是媒介技术问题,而且是巨大的文化差异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模式。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出版史已经成为世界出版史的一部分,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的、跨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古今图书集成》就是当时学者与西方百科全书进行比较的典型对象。

第三章、第四章的研究对象都是《康熙字典》。一部御定书籍在清代的编纂与流布、在近代的印制和发行,这是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过程。只有将其置于清代所谓“同文之治”的特殊语境之中,与同时的其他御定书籍比较,并考察其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出版流变,才能呈现一部书籍的复杂样态和传播轨迹。换个角度来看,梳理一部书籍的生命史,可以窥见中国典籍文化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过程。这种以具体书籍为案例的文化考察,涉及横向与纵向比较,结合微观与宏观考察。可以说,《康熙字典》不仅是一部检字的工具书,而且是中国书籍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从《康熙字典》到新字典的变化,也是新旧知识更替以及工具书转型的过程,尤其具有“知识社会史”的意义。^①

第五章论述古代官修类书的编辑传统及其终结,以“编辑”作为切入点,这里的“编辑”也可以用“编纂”表述。在中国书籍史上,有很多辑录群书资料而编纂的书籍,特别是官修的综合性类书在历代不断繁衍,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理念、编辑体例、编排方法。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种编辑传统及知识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会在近代终结?西方书籍史考察作为“启蒙运动的生意”的“《百科全书》出版史”,并不涉及具体的编辑环节。与之对比,中国古代类书的编辑传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建构了中国古代类聚群书、层层积淀、整合为一

^① 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M].汪一帆,赵博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67.此书指出:“历史学家们需要研究知识的废弃过程”;“当新知识进入某个特定文化时,大学课程、百科全书、档案馆或者图书馆里是否有旧知识被替代了,这一过程可被称作‘文化选择’”。

的知识体系。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类书的编辑传统被百科型辞书体系所取代,但类书的文献价值依然值得探讨。

第六章辨析中国古代的“博物”观念的内涵及来源,梳理古籍中的博物文献资料,目的是结合近代西方博物学科输入的背景,反思中国古代博物文献的文化特征及价值。这种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的跨越,起因是以近代来自西学的博物书籍为参照,追问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博物学,由此探讨源自儒家传统的“多识之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诸多文献的关联,可以说是进入了古代读书人原有的知识视野和书籍世界。研究古代的博物观念以及博物知识,不仅有很多文章可做,而且对当今的博物文化普及和博物书籍出版也有借鉴意义。

第七章至第九章,都是基于古代书籍的编辑体例而展开的文本内容研究。中国古代类书有特定的编辑体例和分类名目,包括收录经过选择的文学诗赋等,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包括史料、典故、辞藻等),或者说古代文人的知识结构就是类书式的,由此可以进行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第七章从类书探讨狐文化与狐文学,这仅仅是一个案例,也是古代博物文化中的动物类型之一。第八章论述诗歌选本《瀛奎律髓》受到类书影响,采用分类体例,其特别突出“梅花”一类的诗歌,呈现了中国古代梅花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观。这实际上也是文人对梅花意象的建构过程,反映了传统的比兴思维对植物花卉文化的影响。第九章分析古代所编辑的大量诗格、诗话、诗选等书籍,其采用摘句品诗的方法,记录了古代诗歌名句被汇集、阅读和传播的轨迹。这三章都涉及古籍的编辑体例与文学创作及文化传播相互作用的关系。

第十章至第十二章,进入书籍的阅读史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人的读书观念和读书方法、不同的阅读群体(文人、家族、女性)、藏书文化等。书籍是文化思想的载体,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甚至什么人(如女性)可以读什么书,这不仅塑造了读者的知识结构和人生观念,更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规范和社会风尚。第十章从总体上比较儒士与隐士,这两个群体有不同的经典文献、读书心态和阅读方式。而陶渊明作为隐士读书的代表,其记录个人读书生活的诗文见证了当时纸质书籍流通及其影响的情况。第十一章论述古代的儒家文化渗透到家族层面,教子读书为士、藏书传于子孙,形成了中国读书文化的深厚基础。第十二章考察女性的阅读史,涉及古代女德教化的规范、才女对阅读空间的拓

展,以此说明近代女学教育、女性解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是书籍阅读史的个案研究,以康熙朝的博学鸿儒朱彝尊的阅读活动为线索,进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康熙帝组织文人编纂《明史》,使文人获得了广泛阅读和私下抄录宫廷藏书的机会;康熙帝对西洋历算天文书籍的阅读取向,对文人阅读和讨论西学书籍有引导作用,也为“西学中源”说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氛围。朱彝尊的大量书跋是个人阅读史的记录,还涉及文人之间的书籍交流活动,展示了博学鸿儒的知识视野,在当时崇尚博综考据的学术风气中具有典型意义。此外,以朱彝尊对利玛窦的看法为线索,以天文历算书籍为媒介,可以关联梅文鼎的著作及其对乾隆朝的才女王贞仪的影响,还有近代梁启超等学者有关利玛窦对中国学术影响的评价。本书所呈现的这种微妙关联,反映了历时性阅读史自然形成的一种轨迹,也记录了利玛窦所输入的书籍在中国学术圈所激起的长久的回响。

第十五章论述书籍作为中学与西学相遇与沟通的媒介,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重要影响。传教士利玛窦以“合儒”的方式解释西学书籍、梁启超早年阅读书目的变化以及所开列的西学书目,二者都是跨文化交流的例证。到了近代,所谓国学概念本来就是中西文化比较与融合的产物,梁启超开列国学书目,要求中国的大学生读中国书,具备“中国学人”的基本素养。这对我们在当今国学复兴的背景下,如何阅读国学书籍、出版国学书籍、建构国学体系,如何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具有温故知新的意义。

第十六章涉及传播史料和传播观念问题。伴随着西方传播学书籍的翻译引进,有关中国的传播史及媒介史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当然,这出于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正如余也鲁在《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探索》一文中所言:“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①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和整理相关的文献史料就是基础工作。如何辨析古籍中有关传播的语词概念,这需要借助文献学的知识,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不是简单与西方传播学的概念进行类比。

第十七章所论古代的“采诗”说,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此说又被近代的办报者反复引述、重新阐释,作为论证的思想资源,这正是梳理中国古代传播观念

^① 宣伟伯.传媒·信息与入:传学概论[M].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最新增订本).

及其演变的一个案例。从古代“采诗”说到近代办报说,其中存在意义关联,这反映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引经据典的思维方式及其演变轨迹,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传播媒介功能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总体来看,书籍史的研究就是“探讨书籍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在社会上传播的”^①。但书籍是一个连接广泛的关键词,囊括了诸多学科,涵盖了复杂的文化层面。一部书籍的生命史可以从古代延伸到近代,再现于当代,通过不同读者的接受和阐释,实现其不朽的价值。考察书籍的历史,可以贯通古今,采用新旧对比以及中西比较的视角,由此发现书籍之间的关联,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因而,中国的书籍史也是文化史,是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史,是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编辑史、出版史和传播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各章虽然有不同侧重点,但见微知著,有着内在关联和焦点,可以统合在“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或者说是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书籍史的不同层面及其个案。本书以章节排列目录,是为了使线索更为清晰,便于阅读。

三、修订情况

这本书曾以《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为书名,于2006年5月出版。此书出版后,本人发现有个别审校未能改正的错字,一直感到十分遗憾;平时读书过程中,有了新的思考、发现新的资料,用小纸条夹在书中,或在书上标注,最终决定对全书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包括:删去原书中的三篇,增入近年撰写的五篇(第二、三、四、十三、十四章),重写绪论,重新编排各章顺序。原书保留的各章除了纠错,在资料上有所补充外,仍保持原来的基本框架。此外,书名改为《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更能体现以“书籍”为中心的整体思路,凸显中国书籍史的文化特征。

本书各章内容是近十多年来陆续完成的,是对笔者平日读书、教书、写书过程中有所感悟和收获的一个小结,也可以说是个人阅读史的一种记录。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专业基础,有助于阅读古籍和检索各种资料。但如何研究书籍的复杂系统,还需要不断拓展学术视野。1995年由于编辑学专业的教学需要,笔者开始关注中国的编辑出版史研究,曾参加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的多次学术研讨

^① 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8.

会;后来在邵益文等先生指导下,承担了《普通编辑学》一书“编辑活动的发展历程”一章的写作^①。随着西方传播学书籍的翻译引入,笔者从媒介环境学派有关媒介史的研究获得启发,开始将中国典籍作为一种传统媒介形态,探讨其在传统社会的流通以及为读书人所阅读的实例、在近代受到西学书籍影响而发生演变的过程,于2006年出版了《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一书;此后,参照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视角,将“印刷文化”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概念,探讨书籍的媒介特征及其文化价值、中国编辑学与西方媒介论的比较、中国印刷文化的特点、民国时期的书籍传播现象等问题,于2015年出版了《印刷文化的传播轨迹》一书。这次修订完成的《中国书籍文化史研究》一书,新增的五篇有四篇是在2016年以后撰写的,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和朱彝尊的案例。本书各章所探讨的问题,既源于多年积淀的古籍文献基础,也来自与时俱进的学术思考。

总之,上述成果记录了笔者以书籍为对象,对中国的书籍史进行探讨的过程。其间岁月匆匆,笔耕不辍,有许多读书的体会,值得回忆。翻检古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考察国学,倾听梁启超一代学者的声音,会豁然开朗;阅读新书,与西方书籍史研究者不期而遇,则默默对话。然而,人生有限,书海浩瀚,不免望洋而兴叹;以蠡测海,更是难免有局限。本书如有疏漏,还请读者不吝赐教。本书中有多篇文章曾在学术期刊发表,在此谨向诸位编辑表达谢意。

最后,引述令人深思的名言:“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②这是当年编辑出版家张元济等知名人士为刊印古籍而发出的声音。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中国的社会文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数字媒介对纸质书籍的出版及读者的阅读产生了很大冲击。我们有必要通过中国的书籍史,温故而知新,获得新启示。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的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绵延不绝,必将焕发生机,我们有责任传承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为之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2020年11月于北京)

^① 邵益文,周蔚华,等.普通编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② 按:此语最初见于《商务印书馆拟刊四部举要略》,载《申报》1915年3月11日第11版。《申报》1920年6月25日又刊发这一广告,最后署名为张元济等25人“同启”。

第一章

古代书籍的编辑与出版概念

中国具有十分悠久的书籍编辑与出版的历史,而且最早发明了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考察中国古代的编辑与出版活动的历史,有助于探讨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为进一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编辑与出版活动所发生的根本变革提供加以比较的基础;还可以参照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视角,回应其中涉及中国书籍史的问题,探讨中国编辑与出版活动的独特价值。

一、古代书籍的编辑概念

(一) 古代“编辑”活动起源

在中国的历史上,编辑活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是中国学者研究编辑学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现有的中国编辑史著述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编辑活动应该从对书籍的编辑开始。因此,本章首先追溯古代书籍的起源,探讨从书籍著述到书籍编辑的发展过程。

古代的“图书”一词,最初是“河图洛书”的省称。班固《汉书》记载:“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①朱熹认为:“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②图书也泛指图与书,是二者的合称。《史记》记载: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

^①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38.

^② 朱熹.原本周易本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

书藏之”。^①明代章潢编纂的类书名为《图书编》，“是编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者皆汇辑而为之说”。^②图书又称为书籍，《后汉书》有“历观古今书籍所载”等句。^③古籍中也使用“书”字代指书籍而组成词语，如读书、刻书、刊书等。

书籍的构成包括文字符号、物质载体、知识内容等要素。中国古代的书籍有不同的形制，从记录在甲骨、缣帛、竹简的文字，到纸质卷轴书，再到印刷版本的册页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历史悠久。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其注疏曰：“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④从文字学来考证，《说文解字》解释：典是“五帝之书也”，也是“大册也”。“册”是象形字，其意思是“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其中“编”字的意思是“次简也”，^⑤是说“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⑥。结合这两个汉字的特点看：中国最初以单音节的“编”字，来表述编次典册的活动——对记载了文字信息的载体（竹简木片）加以编次，就形成了典册。与简牍同时，作为文字符号载体的还有甲骨。甲骨文中的“编”字，从字形上看也是“会以丝次第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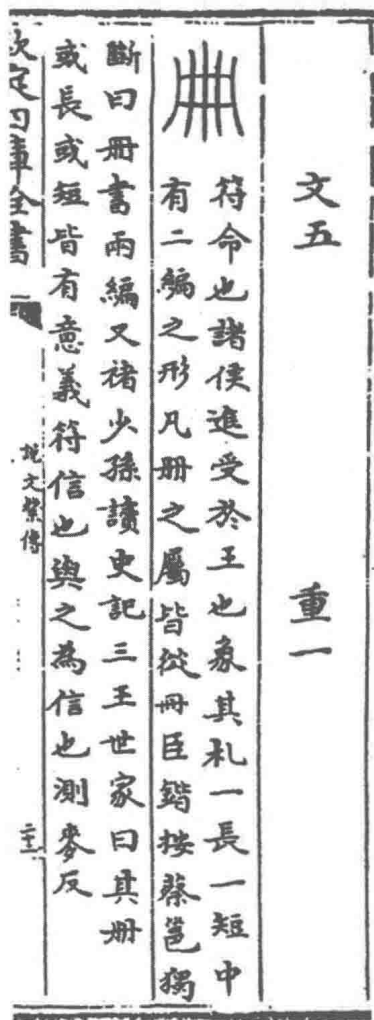


图 1-1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

① 司马迁.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2014.

②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55.

③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397.

④ 孔颖达.尚书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30.

⑤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79:99,48,276.按:札,即木简。

⑥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58.